

试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宫 力

提要 本文依据文献资料,阐述了毛泽东在创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其中包括: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适时提出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与周恩来共同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把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这些基本论点对新中国外交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新中国 外交 毛泽东

作者宫力,1952年生,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最高决策人,也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并且及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述,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开创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夙愿。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引进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去,从根本上划清了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外交的界线,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

(一)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创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建国前夕,全面地提出和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的界线,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

针”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为此,他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

“另起炉灶”的涵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束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外国在华外交机关和人员的合法地位,而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根据这一原则,中共中央于1949年4月26日致电已经占领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等同志: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将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承认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具有继承性,也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机构和驻外人员的合法地位的严肃立场;同时向世界各国宣布了中国愿意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曾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所做出的另一个重大的外交决策。

旧中国是一个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和欺侮的半殖民地国家。随着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垮台,帝国主义的控制权也随之被打倒,“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在中国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势力和影响,也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和自行消失。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给予正确的处理,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毛泽东指出:“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这是新中国对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的总的立场,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强决心。

鉴于帝国主义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进行捣乱和破坏,毛泽东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他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新中国对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同时开始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其中包括收回外国在华驻军权、兵营地产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等;同时加强海关管理,由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制度;对与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前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只作为普通外国侨民看待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将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法律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基本原则作了明文规定。《共同纲领》第五十四条概括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政策和战争政策。”

(二)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格局的时代。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建国之初,由于美国政府推行与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并且把中国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因此毛泽东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告诫中国同志,“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当时,中国与苏联结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政策,是战略上的联合,其目的是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并且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事事听命于苏联,服从于苏联的战略需要。周恩来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地位,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关于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及中苏联合建立潜艇舰队的主张,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主义的霸道做法。中苏之间产生分歧的核心是主权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地位问题。当苏联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并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一个长期对抗的困难时期。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不肯承认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还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并先后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施行军事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同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并从战略上为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使新中国顶住了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到了70年代初,美国政府再无法无视新中国的客观存在,于是便有了毛泽东和尼克松1972年历史性的会见。经过20余年的较量,双方在中美《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共同确认:“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中美两国最终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三)“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建国前后,为了推动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曾经有过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与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关系的战略设想。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曾经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把经济封锁的政策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毛泽东的上述设想未能得到实现。当时,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中国人民不得不立足国内,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同苏联东欧国家加强经济交往与合作。在此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了“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⑪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困难,并成功地发射了原子弹、氢弹,取得了国防工业的巨大成就。

但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过分强调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的一面,而对争取外援为辅有所忽视,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广泛联系性与开放性认识不够,作出了若干不适当的决策。其结果是中国长时间地脱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以致失去了追赶世界先进的机会。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⑫这是应当引以为鉴的。

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独立自主新型外交的时候,冷静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客观现状,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从而为当代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一)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分析战后世界主要矛盾入手,经过慎密的思考和探索,力排众议,于1946年4月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但毛泽东认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⑬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此之后,毛泽东又在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他针对当时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流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⑭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工业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于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而这对于即将在炮火硝烟中诞生的新中国正确地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显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且,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来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对付当时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于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以反对主要之敌的目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建国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十五至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⑮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决心,同时也为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并正确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其晚年,对于国际环境的恶化作出了过度的反应,在战争与和平的估计方面出现了较大偏差,改变了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于可以避免的观点,提出要“立足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多年以战备为中心,直接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后来胡乔木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指出:当时“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这是对“国际环境恶化和对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⑯

(二)“和平为上”的总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的战略观点。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⑪在50年代中期,为了缓和当时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他甚至提出过愿意与美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张,他指出:“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美国干不干。”^⑫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虽然没有得到美国的响应,但也反映出中国为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出的努力。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的谈话中,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并以事实告诫西方国家不要迷信自己的力量,还是用谈判解决问题为好。他指出:“过去西方国家吓了我们几百年,现在到底是它们吓倒了我们,还是我们吓倒了它们呢?因此,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打,如果打,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如果说这是吓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说是根据的,我们是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⑬

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于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 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各个国家的事情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这是新中国外交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由来和主要依据。由此出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准则。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的提出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历史过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包括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崭新的国际行为准则。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解互相补充,对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列宁曾经在苏联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形势下,提出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应和平共处的重要思想。1919年12月,他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宣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进行国内建设”。^⑩但由于当时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列宁生前没有阐明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⑪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⑫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后来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12月31日,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⑬对此,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的发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并且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共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应和平共处的思想,进而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适用于处理所有国家间关系(这包括处理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间的关系)。1954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乌玛·尼赫鲁夫人时指出: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随后不久,毛泽东在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时,再次指出,应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并且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都必须是互利的。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⑭这些论点的提出为化解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

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的战略观点。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指出:“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②5}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如何处理好革命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国家关注的热点,做为一个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毛泽东从来不隐瞒其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支持主要的应该体现为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取代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更不能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毛泽东的这一基本观点把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正确处理外交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毛泽东进而同吴努总理坦率地讨论了一些国家不放心的关于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并且由姚仲明大使在缅甸内部策动”,^{②6}毛泽东的这些话清楚地区分了革命与外交的根本界线,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同不同类型国家和平共处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有利于解除一些国家政府同中国打交道时的疑虑,保证中国同各主权国家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三) 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平等相等

国家之间的平等相等,是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条件。因此,毛泽东坚决主张,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平等相等。毛泽东认为:“所谓大国小国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他指出,那种认为“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论调是“绝没有道理的”。^{②7}毛泽东坚决反对某些大国、强国倚仗实力欺压弱小民族的做法,同时也反对某些大国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搞所谓的“有限主权论”,他曾在多种场合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进行抨击,并热情鼓励弱小国家的领导人要消除对大国的恐惧心理,勇于同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做斗争。他指出:“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他们吓倒,不要怕他们。对于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②8}

中国有过一百多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苦难历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在国际社会中争得到平等的地位。因此,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任何不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决不愿意欺侮、压迫或控制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反复告诫中国同志,不要翘尾巴,要防止我们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搞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接见南共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曾诚恳地表示:“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工业

虽少,但总算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毛泽东还说:中国“过几年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将来中国如果要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要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②9}

当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以超级大国自居,在国际社会中推行霸权主义的时候。毛泽东针锋相对,与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就是从中国经日本到中东到西欧,最后到美国这样一条纬度;周围的国家叫“一大片”的宏大构想,中国外交开始实现第三次重大转变,促成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建立,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对国内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的鲜明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为在世界上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⑭⑮⑰⑱⑲《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第1434-1435页,第1435页,第1184-1185页,第1193-1194页,第1461页,第1466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⑳㉑㉒《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第213页,第186-187页,第186-187页。

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详见《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第13页。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⑪《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1页。

⑫《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

⑮⑰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1959年10月14日。

⑯详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⑲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的谈话,1955年5月26日。

⑳《列宁全集》第37卷,第354页。

㉑《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㉒宫力:《毛泽东外交风云录》,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㉓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1958年8月16日。

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

㉕毛泽东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9日。

(责任编辑 陈冬生)